



政府主导下的民间信仰

——基于额尔敦敖包祭祀的田野考察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2)03-0105-06

● 乌仁其其格

摘要 额尔敦敖包位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至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在1957年祭祀中断之前,它一直是阿巴嘎哈纳尔旗(锡林浩特市前身)和贝子庙共祭的敖包。从2004年开始,额尔敦敖包祭祀变为由当地政府直接组织、参与的大型祭祀活动。在政府主导、国家在场的情境下,敖包祭祀这一蒙古族传统民间信仰仪式,由于祭祀主体地位的边缘化以及仪式操控者身份、目的改变,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文化传统被碎片化地利用,原有功能弱化或被再造。

关键词 敖包祭祀 政府主导 文化传统 碎片化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志码] A

在蒙古各地常见的敖包,被认为是“山川地方神灵的居所”。^①它们既是其信众祭祀天地、山川神祇等自然神灵的地方,也是人们祭祀祖先、英雄人物的祭坛。蒙古族敖包信仰与祭祀,作为蒙古族古老文化的缩影,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敖包信仰与祭祀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对研究游牧文化,研究游牧文化的精神内涵,研究蒙古民族社会文化的演进历程等均具有重要价值。2006年5月,敖包祭祀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下文简称锡盟)是敖包祭祀习俗保存较为完整的地区,锡盟所辖各旗、牧场散布着难以准确计数的各类敖包,当地人都会在特定的时间举行祭祀。我们此次调查的额尔敦敖包就位于锡林浩特市区额尔敦路北部与郊外交界处一座名叫“额尔敦陶力盖敖包山”的小山上,山的南坡下是被称为内蒙古四大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蒙古族敖包祭祀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批准号:10XMZ0021)、内蒙古民俗文化基地项目“蒙古族民间信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注:本文图片请参见封三)

① 扎奇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156.

庙宇之一的贝子庙。贝子庙建筑群依额尔敦陶力盖敖包山而建,拾级而上,到达山顶,便是额尔敦敖包(图1)。

“额尔敦”蒙古语的意思是“宝”,额尔敦敖包便是“宝山”或“宝地”的意思。额尔敦敖包由13座敖包组成。13座敖包坐北朝南,呈一字型排列。主体敖包居中,两侧各6座敖包。主敖包直径8米,高3.5米,两侧小敖包直径及高度依次递减。敖包用当地的天河石垒筑。每座敖包的顶上插满四季常青的松柏枝条,松柏枝条中央立有幡杆,幡杆金顶下挂着铜铸“龙德佛”佛像。每座敖包由五色哈达环绕,敖包之间由悬系着黄、白、蓝、绿、红五色经幡的练绳相连。金色的幡杆、五色的哈达、鲜艳的经幡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数公里外亦可见到,景象蔚为壮观。主敖包南侧建有祭台,祭台前是一个长方形铜制香炉,北侧建有水祭坛(图2)。

据相关文献记载,额尔敦敖包始建于公元1753年,祭礼延续至公元1957年。^①在这两百余年的历史过程中,额尔敦敖包历经变迁。特别是文革期间,敖包被悉数拆毁,直到2003年得以恢复重建。2004年的农历五月十三,在当地政府的组织和参与下,为新落成的敖包举行了隆重的开光庆典及祭祀仪式,这是中断47年后的首次大型祭祀活动。据锡林郭勒政府网、《锡林郭勒日报》等媒体报道,2004年至2010年,每年的“中国·锡林浩特国际游牧文化节”均以在额尔敦敖包传统祭祀日,即农历五月十三举行的敖包祭祀为序幕,展开各项活动。

2010年6月20日至6月28日,我们课题组一行四人,对额尔敦敖包祭祀进行了田野调查。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额尔敦敖包在1957年祭祀中断之前,一直是阿巴嘎哈纳尔旗^②和贝子庙共祭的敖包。从2004年至今,额尔敦敖包祭祀则作为“锡林浩特国际游牧文化节”的一项内容,由当地政府直接组织、掌控。2010年的第七届“中国·锡林浩特国际游牧文化节”为期15天,除额尔敦敖包祭祀外,还包括敖包相会文艺晚会、广场群众文化活动、音乐喷泉焰火晚会、民族产品展示、旅游演艺作品展演、天天那达慕、“走出草原、感受世博”大型自驾宣传活动等8项系列节庆活动。本文即是基于对此次额尔敦敖包祭祀的田野考察。

一、额尔敦敖包祭祀仪式的“再现”

祭敖包习俗具有地域性、多样性等特征,不同地域、不同类型敖包的祭祀时间及祭祀礼仪不尽相同。一般而言,祭敖包通常在每年农历五月至七月间举行,仪式过程大致由祭祀前的准备、正式祭祀及祭祀后的联欢(蒙古语称为“敖包耐日”)三部分组成。

祭祀日前一天上午11时许,我们来到贝子庙广场。我们看到,广场新搭建起30顶簇新的蒙古包,主要用来出售民族服饰、蒙古刀、首饰、沙画等民族特色工艺品,有些蒙古包还兼卖冷饮。一个装有干木材的巨型火撑子放在去往敖包山的石阶路西侧的空地上,据称明天祭敖包时,就是从这个火撑子取火。祭敖包时用的音响设备也放在去敖包山的路的两边。敖包已装饰完毕,围系在敖包练绳上的哈达、经幡已换成新的。祭祀场地整洁干净,广场上人很少。我们被当地人告知,主祭仪式(这里指由当地政府组织的仪式)早上8点开始,我们必须在早上6点前上山,因为到早上6点就封路不让上山了。

(一)民间自发祭祀

祭祀当日凌晨4点,我们赶到额尔敦敖包山前的贝子庙广场时,广场已有很多人,从广场登上额尔敦敖包山的石阶上更是人头攒动。我们随着人流从石阶的右侧登上额尔敦敖包山,石阶的左侧是已经祭祀完敖包下山的人们,上山下山的人群在通往额尔敦敖包山的石阶上形成对流的人流。此时一些公安、武警人员陆续上山,他们负责在主祭仪式举行期间维持秩序。在广场和敖包山上,小商贩在兜售祭祀用的各色哈达、线香、

① 见《重修额尔敦敖包碑文》。

② 阿巴嘎哈纳尔旗,锡林浩特市前身。锡林浩特原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巴图孟克达延汗之后裔领地,明为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别勒古台第十七世孙诺必特默克图的游牧地,所部号为阿巴嘎哈纳尔。清乾隆八年(1743年)建贝子庙,故俗称贝子旗。1953年,经锡林郭勒盟人民政府批准,贝子庙改称锡林浩特。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阿巴嘎哈纳尔旗,设立锡林浩特市,以阿巴嘎哈纳尔旗的行政区域为锡林浩特市的行政区域。

袋装的牛奶等。

在祭拜的人群中穿蒙古袍的人不多,前来祭拜的多数是本市的蒙古族市民,也有从牧区来的牧民。人们登上敖包山后,先把带来的哈达或经幡、五色绸布条等系在环绕敖包的练绳上,再敬献祭品。祭品集中摆放在主敖包的石台上,有牛奶、白酒或马奶酒、奶豆腐、黄油、砖茶、果条等。敬献祭品之后,人们从主敖包的一面起按顺时针方向绕敖包群三圈,也有人是把十三个敖包每个敖包各绕三圈。有些人在绕敖包的同时向敖包洒祭牛奶、马奶酒、白酒等。献祭之后,有些人把额头贴在敖包上面祈祷,有的双膝跪地叩拜(图3),有的站着双手合十,默默祈祷。他们中的大多数,祭拜完就下山离开了,并不参加由政府组织的祭祀。这种民间自发的祭祀从凌晨2点多,一直持续到早上6点半。

我们看到的这种民间祭祀仪式很简单,由于条件的限制,简化了仪式的程序和内容。如没有人诵读祭文,没有喇嘛诵念“敖包桑”(即敖包经文、祷文),而传统的敖包祭祀多数会请喇嘛念“敖包桑”,在喇嘛的诵经声中进行祭祀。再如,在祭品供奉给敖包神之后,所有参加祭祀的人员会有一个分享祭品的仪式,而这个仪式也没有了,人们或把祭品放在敖包的石台上,或直接用奶或酒洒祭,然后绕敖包三周就结束了。整个祭祀仪式完全是自发进行,没有人组织,没有领祭人,人们随来随祭,仪式简化、随意。可能唯一没变的是人们对敖包的信仰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依恋。

(二)“主祭”仪式

“主祭”仪式指由官方组织、参与的祭祀仪式,大致由入场及取火点火仪式、绕敖包、供奉“诈马秀斯”(烤全羊)三部分组成。

早上7点,民警和武警开始清场,清场后在敖包群三面及登山的主路两侧拉起了警戒线,把民众隔离到警戒线之外,只留下下山的通道。通道两侧有武警把守,阻止除政府组织的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上山。据称在“主祭”现场聚集了两三万人。在祭祀过程中,武警锡林郭勒盟支队动用了兵力及车辆,还有一些公安人员也在现场执勤。武警在警戒线之内分两排站立,一排背向群众,一排面向群众,阻止人们进入祭祀场地。有前来祭拜的人跟警察争论:“祭敖包是老百姓的活动,为什么领导和记者能进,普通老百姓就不能进?”

1. 入场及点火仪式

清场之后,喇叭里响起了诵经的声音。在祥和的诵经声中,由政府组织的祭祀活动拉开了序幕。贝子庙的喇嘛们身披袈裟、手持法器,鱼贯进入祭祀场地。喇嘛们作着祭祀前的准备,有的在调试法器,有的在祭桌前摆放祭品。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陆续进入场地。祭祀仪式在主敖包南侧举行,穿着红色蒙古袍的姑娘们把祭品、祭祀用的桌椅、叩拜时用的垫子、哈达等依次端到祭祀场地。身着鲜艳蒙古袍的工作人员分别在祭坛、铺着黄色绸布的三张桌子和祭坛前的地上摆放祭品。地上,祭品整齐地排成九行,每行九份,共九九八十一份祭品。这些祭品都放在铺有蓝色哈达的长方形铝制托盘中,有奶豆腐、牛奶、黄油、奶皮子、白酒、茶叶、水果、炸果子等等。

8点钟,法乐齐鸣,众喇嘛点燃香火,在香烟缭绕和法乐声中,诵念“敖包桑”(图4)。8点30分,“主祭”仪式开始。

首先是取火及入场仪式。取火仪式在山下举行。当天的《锡林郭勒日报》报道:“在古老的圣火颂词声中,阿巴嘎哈纳尔旗后裔按蒙古族传统取火方式引燃火炬。”火炬手用火炬从放置在通往敖包山路边的火撑中取火(图5),继而由火炬手引路,祭祀队伍登上额尔敦敖包山,进入祭祀场地(图6)。跟随其后的依次是身穿蒙古袍、手捧蓝色哈达的四位阿巴嘎哈纳尔旗后裔(其中一位是领祭人、盟人大工委主任阿迪雅,另一位是当地的民俗专家,是在仪式中宣读祭文的,其他两位身份不清楚),身穿蓝色蒙古袍、手捧蓝色哈达的六名蒙古族少女,抬着祭祀的牺牲——“诈马秀斯”(烤全羊)的九位男子(“诈马秀斯”放在有把手的长方形木盘中,每只由三人抬),其后是锡盟和锡林浩特市各级领导,最后是身穿各色蒙古袍、手捧祭品的锡林浩特市各单位的代表,以及锡盟某职业中专的学生,学生们都穿着簇新的蒙古袍。

入场仪式后,主持人用蒙汉双语介绍来宾和敖包祭祀活动的程序。据介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巡视二组组长,自治区农村信用联社主任,锡盟人大工委主任,锡盟政协主席及副主席,锡盟盟委委员,锡林浩特市委

书记、副盟长,锡林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席及盟市几大班子的领导出席(图7),当然还有锡盟的各界群众代表。领祭敖包的是锡盟人大工委主任。

其次是点火仪式及领导讲话。火炬手将火送至山顶,点燃香炉中的线香,然后站在了主敖包的东南部。“诈马秀斯”及其他祭品摆放在主敖包正前面的圆形祭台上,全羊呈跪姿,头高昂,嘴里衔着绿草,角用黄色或红色的绸子装饰,煞是好看。祭品摆放完毕后,锡林浩特市市长致开幕词,并宣布“中国·锡林浩特第七届国际游牧文化节开幕式暨额尔敦敖包祭祀大典仪式开幕”(图8)。接下来,当地民俗专家道尔吉苏荣用蒙古语诵读敖包祭文(图9)。祭文由道尔吉苏荣本人创作,内容有对敖包的赞颂、祈求以及对人们的美好祝愿。

2. 绕敖包

在喇嘛诵念“敖包桑”、领导讲话、民俗专家诵读敖包祭文之后,九位青年男子身着蒙古袍,骑白马,肩上背着弓,马鞍上挂着箭袋,手持招福箭,列队疾驰,环绕敖包三圈,喊着“呼瑞!”“呼瑞!”据称原来额尔敦敖包祭祀中,九位骑手是围着贝子庙和敖包山绕的,但现在由于建额尔敦敖包山公园时周围增加了一些建筑,变为只能绕敖包了。随后,喇嘛们手持法器顺时针绕敖包群三圈。喇嘛之后,是参加仪式的领导和各族群众代表的队伍,他们手捧哈达顺时针绕敖包三圈(图10~图12)。

3. 供奉“诈马秀斯”

主祭人与另外两位男子按照蒙古族民俗传统,从全羊的不同部位割下小片的羊肉放在礼仪小姐端着的托盘里,再由礼仪小姐向敖包供奉。供奉“诈马秀斯”是献祭仪式的高潮,此时,会有站在旁边的人,向主祭人讨要“秀斯”,主祭人会象征性地分小块肉给他们。人们先向敖包供奉一半儿,再自己吃一半儿(图13)。

至此,警戒线内的仪式结束,警戒线外的群众蜂拥入场,其中的一些人开始了自己又一轮的祭祀,还有一些人哄抢祭品。转眼之间,祭台上的奶食品、两只全羊等祭品不见了,甚至放在敖包石台上的祭品也不翼而飞。

蒙古族传统敖包祭祀中,分食祭品是在“敖包神灵”享用祭品之后进行,一般由主祭人按照长幼之序分给参祭者。蒙古先民认为,神灵享用祭品后,祭品已经带有神性,神灵会把福祉寄寓在祭品中,参祭的人分食祭品,便可得到神灵的赐福与护佑。在分食祭品的过程中,人们一方面得到了神灵的赐福,一方面传承了蒙古族传统的祭祀文化。

据当地人称,抢祭品的大部分人是汉族。就此情况,我们问了一位抢到羊头的人,他说他们参加祭敖包的目的是抢祭品。当问起为什么要抢祭品的时候,他说:“因为听人家说抢到了好、吉祥。”

“敖包耐久”,即赛马、射箭、摔跤等项目,在一个叫葛根塔拉的旅游点举行。

二、对额尔敦敖包祭祀仪式的解读

1. 文化主体边缘化

随着社会的演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敖包信仰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革,在额尔敦敖包祭祀中,出现了民俗文化主体边缘化的情况。从以上介绍的仪式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敖包信仰的主体没变,依然是蒙古人,但在整个仪式过程中文化主体被边缘化,信仰主体的祭祀行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行为。如前文介绍,在额尔敦敖包祭祀过程中,由官方组织的仪式在当地的话语中被称为“主祭”仪式,而普通民众是在“主祭”之前或“主祭”之后进行祭祀。在整个“主祭”仪式过程中,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是站在警戒线之外的。

还有许多真正对敖包怀着虔诚信仰的人多数在早晨三四点钟开始上山祭祀,完成祭祀后即刻下山,并不参加由政府组织的祭祀。留下来观看“主祭”仪式的人除一部分本市市民外,还有游客、媒体记者以及据称是等着抢祭品的人。

任何社会关系都要在仪式“展演”中扮演各自的角色,额尔敦敖包祭祀仪式完全在政府的组织和参与下进行,领祭敖包的是锡盟人大工委主任,锡盟和锡林浩特市的相关领导都出席了祭祀仪式,政府还动用了武警维持秩序,当地政府作为仪式的组织者和主持者,无疑是整个仪式的中心。对当地政府而言,对敖包祭祀仪



式的操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生活和权力运作的一部分。对敖包祭祀的掌控与利用为的是“有效促进我盟如火如荼的民族文化大盟建设进程”,最终目的是发展经济。而文化主体由于文化自决权与话语权的缺失,其主体能动地位很难体现。

2. 仪式操控者的目的变了,仪式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蒙古族传统敖包祭祀虽然兼具多种功能,但主旨是祭神,它是一种民间信仰行为。而如今的额尔敦敖包祭祀作为“锡林浩特国际游牧文化节”的项目之一,被认为“已经成为全市发展旅游业的一大特色品牌”,组织如此大型的祭祀活动是为了“带动城市知名度”,从而提高旅游收入。《锡林郭勒日报》报道:包括敖包祭祀在内的“游牧文化节已经成为锡林浩特市投资兴业、观光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仪式的宗旨正如锡林浩特市市长闫宏光在开幕词中所言:“锡市依托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文化内涵,以传承民族文化、展现草原风情、促进交流合作、推动经济发展为目标。”所以,当地政府走的依然是“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路子。

传统敖包祭祀活动中也有经济行为,但在传统社会,民间信仰活动中的经济行为大多为自发的。而当代社会,民间信仰被卷入了市场经济的洪流,如各地政府把开展旅游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积极寻找可利用的旅游资源。蒙古族敖包祭祀因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被政府纳入到发展地方经济的范畴内,被当成发展地方经济和提高地方知名度的招牌。这样做,可能一定程度保留了民间祭祀行为的外在形式,但其实际效果是消解了其精神蕴含的原真性,制约了地域文化和区域文化对社会和谐的促进作用。

3. 文化传统碎片化

政府主导下的仪式隆重、热烈,规模盛大,组织严密,光鲜艳丽,更具表演性和观赏性。从外在形式看,整个仪式过程融入了许多传统文化元素,但同时,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似是而非的传统。如,在祭祀仪式中增加了火炬手点火仪式,整个队伍是在火炬手的引领下进入场地,在仪式现场还有很多身着蒙古袍的礼仪小姐,向敖包献祭品。仪式结束后我们访谈了当地的一位民俗专家,据他介绍,人们在春天祭敖包的主要目的是求雨,而祭火一般都是在秋末或冬初。“明天还要放个火撑子,这跟以前的祭祀是很不相同的。传统说法是水火不容,所以祭敖包时是不应该祭火的。”

有关敖包的禁忌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禁忌是女子不可以上敖包山。一位当地的蒙古族人说,敖包是神圣的,如果女人上敖包的话,对女人和敖包都不好,而现在社会女的都可以上。另外一名当地的退休干部介绍说,蒙古人除了五月十三祭敖包外,平时很少上敖包山,敖包是有忌讳的。如果牧民的马在敖包山上吃草的话,会被慢慢地牵回来。“我们的额尔敦敖包现在乱套了,既是旗敖包、苏木敖包,又是额尔敦敖包公园,是人们锻炼的地方,还是旅游景点。我是一年只上一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他接着说,现在的敖包祭祀都按着政府官员的意思去办,一般老百姓参加不了。虽说跟着时代发展,但改了许多原来的东西,这非常不好。

另一位贝子庙的喇嘛说,现在的敖包祭祀就像拍电影,都是给别人看的,表面上没变,但里面存在的意义都变了。现在虽然还在祭敖包,但没有人认真对待,也不会按民俗规定去做。

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也有一些人对于敖包祭祀仪式中的某些变化表示能够接受。如有一位当地人表示,敖包祭祀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东西是允许发生变迁的,它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时代和社会改变的需要。但有更多的人,对额尔敦敖包祭祀中出现的问题表示出深深的困惑、担忧和无奈。

当地一位民俗专家如此解释了祭祀敖包的过程和意义:第一,喇嘛要诵念“阿荣桑”。敖包在日常生活会被玷污,以此来清洁敖包。第二,邀请敖包神灵。第三,赞颂,请来神以后必须赞颂。第四,献祭,祭品种类因敖包类型的不同会有所不同。第五,祈求,祈求人畜平安,风调雨顺。第六,也就是最后,供奉全羊,即按照民俗传统,把全羊特定部位的肉割下包在哈达里奉献给敖包。祭祀完成后人们分食祭品,以得到神灵的赐福与护佑。

可见,传统的敖包祭祀仪式是由彼此有着内在意义关联的部分组成的整体。而在额尔敦敖包祭祀中,传统文化元素被断章取义,传统符号的象征意义变得模糊不清,传统文化被碎片化地利用。如将蒙古族的尚火

习俗用在了祭敖包中,在祭祀过程中,领导讲话成了祭祀的主要内容,祭祀刚结束祭品就被哄抢一空等。传统的文化符号逐渐脱离本土语境,被放置在城市化、市场化的激流中,传统文化正在脱离原有的、整体性的文化结构,成为缺乏深层意义和内在逻辑联系的文化碎片。不只是祭祀的神圣性降低,其意义也面临消解或重新建构。与此同时,在政府意志和大众媒体的合作下,那些传统文化的碎片与拼贴合法化。敖包祭祀仪式结束后,当晚锡林郭勒电视台播放了整个祭祀仪式的过程,《锡林郭勒日报》也以很大的篇幅报道了祭祀的盛况。在不了解蒙古族民间信仰习俗的人看来,敖包祭祀就只能是当前看到的样子。

4. 敖包信仰的原有理念被悬置,原有功能正在丧失或再造

敖包祭祀是蒙古族保留至今的主要祭祀活动之一,是蒙古族敬仰、崇拜大自然,爱护山河草木,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象征。敖包祭祀可以看作是一种草原生态祭祀文化,与敖包信仰相关的种种禁忌,如敖包周围不得砍伐树木、挖坑取土,不得打猎,更不得开荒种地等禁忌,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草原生态的作用。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敖包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巩固群体的历史记忆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加强区域社会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繁荣民间文化生活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敖包祭祀及游艺活动,是民俗群体确认维系、改善社会关系和权力的一种方式。

举办祭祀仪式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生产的过程,然而,在不同时期,这种文化生产的功能是不同的。在传统社会,这种生产基本上旨在满足当地人的精神需要,以表达祛除灾病、祈盼丰年等意义。同时,集祭祀、游艺、竞技于一体的蒙古族敖包祭祀,也能促发当地社区的互动和交流。然而,如今这种生产更像是一种商品生产,它的目标已不在于满足当地社会需求,而在于吸引外地游客,这就需要充分考虑外地游客的观点和品位,用“民族特色”来吸引外地人的眼球。当地政府“打造敖包文化”的目的,是发展旅游业。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随着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在许多显性文化走向同质化,人们的传统观念发生动摇的时候,民间信仰相对稳定地维持着传统文化的精神追求,为民族文化特征的保持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然而,国家权力对这一传统文化空间的侵入与控制,会对这一民间文化的走向带来怎样的影响,值得人们深思。

参考文献:

- [1] [英] 鲍伊. 宗教人类学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2] 史宗主编, 金泽等译. 20 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5.
- [3] 郭于华. 仪式与社会变迁[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4] 王铭铭等. 象征与社会: 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收稿日期] 2011-10-09

[作者简介] 乌仁其其格(1959~), 女, 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授, 博士, 电邮: qiqigewuren@163.com。呼和浩特 010022

Folk Belief Led by the Government——Based on the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Sacrifice of the Eerdun Oboo

Wurenqiqi ge

Abstract: Located in Xilinhot of Inner Mongolia, Eerdun Oboo has existed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up to now. Before the ritual was interrupted in 1957, Eerdun Oboo had been sacrificed by Abahanaer banners (the predecessor of Xilinhot city) and Beizi Temple. Since 2004, the sacrifice of the Eerdun Oboo has become a large-scale sacrificial activity organized and partaken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directly. Led by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presence of the State, the Oboo sacrifice, a traditional Mongolian folk belief, is endowed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As the agent who hosted sacrificial rites has been marginalized and the identity and goal of the rite controller is changed, cultural traditions are fragmentally used and their original functions are weakened or re-built.

Key words: Oboo sacrifice; government leading; cultural tradition; fragmented

民间信仰

——基于额尔敦敖包祭祀的田野考察

图/文：作者提供



拾级而上便是额尔敦敖包



额尔敦十三敖包



晨曦中虔诚祈祷的老额吉



法乐声中，喇嘛诵读经文



火炬手从火撑中取火



火炬手引领的祭祀队伍



进入祭祀场地的领导



锡林浩特市市长致开幕词



道尔吉苏荣诵读敖包祭文



绕敖包的骑手



绕敖包的喇嘛



绕敖包的群众代表



供奉“诈马秀斯”